

中国海洋文化与 海洋文化产业开发

毕旭玲 汤 猛 著

文化产业创新研究丛书·刘轶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海洋文化与 海洋文化产业发展

毕旭玲 汤猛 著

文化产业创新研究丛书·刘轶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化产业开发/毕旭玲,汤猛
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7

(文化产业创新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473 - 0975 - 9

I. ①中… II. ①毕… ②汤… III. ①海洋-文化产
业-研究-中国 IV. ①P7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0727 号

中国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化产业开发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186 千字

印 张:7.625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975 - 9

定 价: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目 录

导论/1

第一章 中国海洋信仰文化资源及其产业开发/25

第二章 中国海洋节庆文化及其产业开发/45

第三章 中国海洋休闲文化及其产业开发/75

第四章 中国海洋影视及其产业开发/107

第五章 中国海洋文学艺术及其产业开发/124

第六章 中国海洋工艺美术品及其产业开发/158

第七章 中国区域海洋文化及其产业发展/173

第八章 科技与海洋文化及其产业开发/203

参考文献/229

后记/233

导 论

一、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早在蒙昧时代,滨海原始先民就利用近海的地理优势,采集贝类生物作为食物的重要来源。先民采食贝类的历史极悠久。《韩非子·五蠹》说:古时“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说明当时先民还不会用火,处于脱离动物界不久,也就是传说中的有巢氏时代。这些贝类动物的外壳大量堆积,与当时的先民生活遗迹一起成为当代考古发现中的贝丘文化。贝丘是先民往固定地点抛弃采食的介壳类动物遗骸而形成的丘状堆积,往往分布在房址周边。一般来说,一个原始聚落会有多个贝丘。有些贝丘是被长期利用的,所以小贝丘连成大贝丘,贝丘之间相互叠压。当然,无法食用的贝壳也不是全部被抛弃,有一些经过简单的穿孔、打磨之后被制作成项链等饰品。在辽宁省海城市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利用动物牙齿和贝壳做成的穿孔项链。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也发掘了3枚钻孔的海蚶壳。^② 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贝类装饰品的出土更加多见,加工工艺也更加成熟。

贝类仅仅是先民食谱中的一类海产。到了燧人氏时代,先民学会了使用火,并且学会了捕鱼的方法。《尸子·君治》云:燧人“教民以火以渔”。传说中的燧人氏不仅发明了火,还发明了捕鱼

① “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吴越地区海神信仰的传播研究及其图谱化展示研究”(批准号:15BZJ042)的前期成果。

② 马莉. 先秦工艺美术概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3: 55.

的方法。“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尸子·君治》)火的使用巩固了海生生物在先民食谱中的重要地位,因为烤熟的海产显然味道更鲜美。到了“教民狩猎”的伏羲氏时代,原始渔猎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先民逐渐学会了用网捕鱼,故有庖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周易·系辞传》)的记载。用网捕鱼使捕鱼活动可能脱离饱腹的最低级需求,导致了原始渔业经济的出现。因为捕鱼技术进步的结果就是产量的增多,吃不掉的鱼可以用来进行原始交换。而鱼骨也可以用作人体饰品,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也出现了钻孔的鱼眼上骨。

随着原始渔业经济的发展,独木舟和木筏等水上作业工具的制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最早的渡水工具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不得而知,古人对此有一些猜想。《世本》说:“观落叶因以为舟。”《淮南子·说山训》说:“见窾木浮而知为舟。”也就是说原始人看到海边落叶或干木、残木等在水上漂浮而产生了制造舟、筏的想法。这也是可能的。落叶中间凹陷四周高起、中间宽而两端窄的形状启发原始人制造独木舟,而木头漂浮水上的现象启发原始人将数段木头连接成木筏。《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云:“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这是早期竹筏的记录,与木筏的制法相仿。为了控制舟、筏行驶的方向,原始人又参考鱼鳍等自然现象创制了橹、蓬、楫等工具。所以《名物考》说:“观鱼翼而创橹。”到黄帝时期,舟楫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周易·系辞传》说:“黄帝、尧、舜垂衣裳……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这一时期正是我国的新石器时期。考古发现证明了新石器时期我国滨海先民曾利用独木舟等工具走向海洋。

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四明山和慈溪南部山地之间的一条河谷平原上曾发掘出距今7 000—5 300年的河姆渡遗址,遗址出土了6支木桨。木桨采用整段木材加工而成,“桨叶呈扁平状,柄部粗细适中,自上而下逐渐变薄,线条流畅,形状有些像江南水乡使用的

手划桨。其中一支桨,残长 63 厘米、叶长 51 厘米、宽 15 厘米,色泽赭红,木质坚硬,在柄与叶的交界处刻有对应斜线的几何图案,制作精湛,美观实用,其更像是一件杰出的工艺品”。^① 同时又出土了石镞、石斧、石凿等可以用来制造舟船的工具。在河姆渡遗址中还采集到两件舟形陶器。“一件长 8.7 厘米、宽 3 厘米、高 3 厘米,器型呈长方形;另一件长 7.7 厘米、高 3 厘米、宽 2.8 厘米,两头稍翘,舟体呈半月形,船首有一鸡胸式穿孔小釜。”^② 这些出土器物表明滨海原始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制造独木舟。这些独木舟不仅用于内河航行,还在近海地区穿梭往来。20 世纪 70 年代在宁绍平原东部的滨海地区、东海的舟山群岛发现了新时期时代遗址几十处。其中就有不少属于河姆渡文化类型的遗址。^③ 这些遗址的发现证明在 5 000 多年前的东南沿海地区,河姆渡人已经借助舟楫之力到达舟山群岛,并把较为先进的河姆渡文化传播到舟山群岛上。

在原始部落时期,与海洋有关的经济门类除了渔业经济、舟船制造经济之外,海盐经济也到了发展。清代汪汲《事物原会》说:“《世本》:黄帝时,诸侯有夙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盐。其色有青、黄、白、黑、紫五样。”《路史》引宋衷注为:“夙沙氏,炎帝之诸侯。”《太平御览》引宋衷注为:“宿沙卫,齐灵公臣。齐滨海,故卫为渔盐之利。”宿(夙)沙氏的传说说明炎黄时期我国的海盐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从以上论述可见:古代滨海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审美观念和行为等都与海洋密切相关,并形成了原始海洋文化。原始海洋文化是中华原始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从中华文化诞生的那

① 李跃. 再议河姆渡人的水上交通工具. 东方博物, 2003-06-15.

② 同上.

③ 王和平, 陈金生. 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 1983(1).

一刻起,就已经被注入了海洋的因子,具有了海洋的特征和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涉海实践以及人群交往的发展,中国海洋文化一方面向深广的海洋发展,另一方面也深深影响了中华内陆地区。

从成熟的独木舟开始,滨海地区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尚书大传》说:“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贝,如车渠,以献纣。”商末,纣王将周文王囚禁,文王四友之一的散宜生为赎回文王向纣王进献了砗磲(车渠)。砗磲是贝类中最大的一种,产于太平洋、印度洋和我国南海中。所以获得砗磲的航行至少要到达南海。另外,商灭之后,一部分殷商贵族乘船出海逃难,可能航行至今美洲。房仲甫对美洲出土的文物,以及中国的文物和古文字等材料进行研究后,得出“殷人逃亡者偶趁大风漂泊到达美洲的推论是可以成立的”。^①由上述两个例子可以想见当时先民的远航能力。

古代吴越地区的造船术和航海术比较发达。《逸周书》有“成王时,于越献舟”的记载。于越即越,是分布于长江以南沿海地带的古代民族,也就是现代闽浙沿海一带的先民。这个记录说明在周王朝时期,东南沿海一带的造船技术已经比较发达,所造之船较为精美,才能敬献给天子。春秋时期的越国设有专管造船的官署,已经能较大规模地建造弋船、楼船等战船。(《越绝书·外传记[越]地传》)战国时期的《慎子·逸文》也载:“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故也。”就是说到先秦时期,中国东南沿海航运已经比较发达。正所谓“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太平御览·舟部一》)。在吴越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支持下,吴楚越之间的争霸战争屡以海战的形式出现。根据《越绝书》的记录,当时吴国可以造“大翼船”。船长十丈,宽一丈五尺二寸,可乘官兵九十

^① 房仲甫,殷人航渡美洲再探.世界历史,1983(3).

多人。

航运经济之外,夏商周时代的其他海洋经济门类也有了较大发展。夏朝海洋捕捞和海岸带制盐已有一定的规模。沿海地区缴纳的实物贡税主要是各种海货和海盐。比如《尚书·禹贡》就记录说吴越地方的贡赋是“蠙珠暨鱼”。到了周代,渔盐成为各沿海地区的主要经济门类,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达,提高了其政治实力。《周礼·职方氏》说:“东北曰幽州……其利鱼、盐。”这是关于辽宁、河北渔盐发展的情况。《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通鱼盐之利,则人物归之。”周初姜太公在山东开发渔盐生产,提高了经济实力,于是很多人归附齐国。吴越等沿海诸侯国,其渔盐生产也较发达。《汉书·荆燕吴传》记载:“吴……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先秦时期,以舟楫、渔、盐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海洋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的发达,技术的进步以及海洋经济的发展,为先民进一步探索海外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原始时期到先秦时期,先民对海洋的探索还表现在大量的海洋神话传说中。比如《山海经》是一部反映中国先民山海观的地理著作,以古籍、传闻和想象描绘了海洋神灵和海外奇人、奇物、奇事、奇景,塑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它反映了先民对探索海洋和海外世界的渴望。正是这种探索的渴望激发了以后的种种涉海实践。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后,中国海洋文化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第一,随着秦帝国的统一,中国开始形成了地跨南北的统一海疆,有利于各口岸之间的联系。第二,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大修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这些工程使原来分属各地的沿海港口成为一体,并拥有了更广阔的腹地和更便利的交通。第三,齐、吴、越三个传统海上强国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在统一的新王朝得到了整合发展,促进了秦帝国的造船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在中国

海洋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徐福东渡事件发生了。徐福以为秦始皇求仙药之名,率船队从琅琊台启航北上,先行至荣成山,又由此折向西,航行至芝罘(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沿海),并继续率船队经庙岛,再由朝鲜半岛西部近海折南而行,横渡朝鲜海峡,到达日本。^①徐福的船队包括数千名童男女、五谷百工,以及渔猎工具,成为汉文化传播日本列岛的先驱,为开启日本文明历史发挥了巨大作用。公元七八世纪后,日本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徐福的记载。徐福被日本民众尊为司农耕、医药之神。徐福船队在经过朝鲜半岛时还可能留下了部分人员与物资,这也是中华文化向朝鲜半岛传播的较早记录。

汉代各项海洋技术继续进步,海外商业贸易更加兴旺发达。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处近海”的交趾、日南(均在今越南),“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书中还记述了一条中国商船去南海和印度洋一带的航线:从合浦郡的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出发,经都元国(在马来半岛),再陆续经邑卢没国和谶离国(均在今缅甸沿海),最后抵达黄支国(在今印度)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汉代还在滨海港口设立了最早的“海关”,官员“候”进行管理,其职能是稽查。《列女传·珠崖二义》记录了汉代海关官员稽查走私珍珠的事情:某珠崖令死后“遂丧妻归,至海关。关候、士吏搜索,得球(珍珠)十枚于继母镜奁中”。

汉王朝还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海军,公元42年,伏波将军马援曾南征交趾,率大小楼船两千艘,战士两万余人。可见汉代楼船水军规模之大。楼船是汉代最著名的船舰,也是汉代水军的主要战船,其鲜明特征就是船上有宫室楼阁。根据东汉刘熙所著的《释名·释船》记载,汉代楼船的甲板之上有三层舱室,分别被称为庐、飞庐和爵室。楼船的舷边设有半身高的女墙,以防敌方的矢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胶南市委员会. 千古琅琊台. 青岛出版社, 2013: 30.

石。女墙之内第一层就是庐，庐上的周边也设有女墙，女墙内战士手持长矛。庐上一层是飞庐，弓弩手就藏于飞庐内部。最高一层为爵室，相当于现代舰船的驾驶室和指挥室。而楼船的甲板下有划桨的士兵，甲板上手持刀剑的士兵。

从秦到汉，中国海洋文化迅速发展，从海洋经济到海洋军事都逐渐建立起一个海洋大国的形象。作为统一的帝国，这一时期海洋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帝国文明的一部分。正是在海洋文化的带动下，中华文明继续发展，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

三国时期的中国虽然政局动荡国家分裂，但东南沿海的东吴政权采取的种种措施如鼓励海外贸易等依然促进了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发展。《吴都赋》载：“富中之忙，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政府组织的海外开拓在这一时期也在继续。孙权曾派船队出使东南亚各国，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商贸联系。公元233年，将军贺达等率兵七万余人载金银珠宝珍奇货物远航到辽东半岛、高丽国。驰往大秦船只是“张七帆”的大船，大船有二十多丈，离水面高达三丈左右，载客六七百人，载物万斛。^①东吴船队还曾到达了海南岛和台湾等地。

隋唐时期，我国又迎来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在前代所积累的技术、物质和文化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十分繁荣，“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熟。当时海外贸易主要分为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东海起航线从登州港（今蓬莱市）起航，沿黄海至朝鲜、日本列岛等诸国；南海起航线沿黄海前往宁波，并沿宁波、泉州一路南行，一直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再穿越马六甲海峡到中亚诸国。随着航路的成熟，朝鲜、日本、印度等折服于大唐文明的海外国家纷纷遣使来华朝贡。这些朝贡活动加强了大唐与周边诸国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巩固了中华文化圈。中国海洋文化

^① 姚文仪. 梅岭集. 中西书局, 2012: 101.

由此更加昌盛。大唐帝国的统治者以分封四海来彰显中华文化的核心地位。“是月丁未,封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①此后,历代皇帝都派遣使者分别祭祀四海。代表海洋的四海海神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海洋文化也由此上升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元时期的海洋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为航海和船舶制造技术以及海外贸易两方面。指南针于此时被运用到航海中,在海洋航行中具有重大意义。宋代海船建造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造船业很兴旺,东南沿海的杭州、明州、温州、秀州等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规模之大、船体之精巧宏伟令高丽人“欢呼嘉叹、倾国耸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神舟》)。此时还发明了先进的“水密舱”设计和装甲踏轮战船,所建造的巨型海舶安全且快速,来华的外国商人大多都乘坐中国的商船,依附中国船队进行贸易。

有宋一代军事失败惨重,不得不向北方军事强国交纳高额岁币。军费与岁币导致宋朝国库空虚,政府不得不大力开发海外贸易,以增加财政收入。北宋政府重视保护外商权益,明令外商可向朝廷控告、上诉不法官商。政府还积极解决外商的困难,一旦船只遭遇海上风险将尽力给予援救。有时还会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在种种优待政策之下,宋代海外贸易还是相当兴盛。宋政府每年能从海外贸易中得到几十万到百万的收入,如宋高宗所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

到了元代,统治者依然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因为他们认识到:“有市舶司的勾当,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元典章》卷二十二)元代在航运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件事是大规模的海上漕运。元朝的

^①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三三.中华书局,1960.

政治中心大都远离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每年都要从江南运输大量粮食以应付军饷、官俸及朝廷的各种开支。但南北大运河阻塞,江南漕粮无法北输。海运比河运更具有时间短消耗少的优势,为了保障京师供给,元政府因此决定开辟漕粮海运。当时的上海县是漕粮海运的重要基地。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政府派征东留后军镇守上海,以确保港口安全与江南沿海顺畅。后来,元廷又招安了上海崇明海盗朱清和张瑄,会同上海总管罗璧,共同负责造船运粮,试行从江南港口出发,海运漕粮至京城。上海成立漕运万户府,而以近处的刘家港为发运的起始港。漕粮海运开辟了上海港北洋海运航线,加上原来既有的由闽广船及西洋各国商船所开辟的南洋海运航线,使南北航运得以沟通,两条海运航线以长江口为交汇点。

宋元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域外地理著作,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记录了海外诸国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情况,是我国海洋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

宋元时期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与羸弱的内政和军事相比,宋王朝的海洋事业相当发达,因此海洋文化的影响力在宋代可能已经超越了农耕文化。到了元代,统治者只将中原视作他们的牧场,农耕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视,反而是海洋文化因为航海贸易利润的丰厚还较受重视。

明代是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顶峰时期,标志性的事件是郑和下西洋。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奉命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郑和船队经东南亚、印度洋、亚洲、非洲等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郑和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郑和船队每次都有五六十艘大型宝船,船上装满了各种精

美礼品和货品,还包括充足的食物、水和日用品。郑和船队成员人数众多:“计下西洋官校、旗官、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四百三员……”^①郑和宝船结构宏伟,以郑和乘坐的一艘为例:“底层以砂石压舱;二、三层运载货物和食品;上面靠近甲板的一层是客舱,住士兵、下级官员,并有20门炮位;甲板有火炮、操帆铰盘,舱后舵楼有四层;其中二层为官厅,郑和、王景弘就住在这里。”^②

郑和的七次海上大型贸易交流活动,传递了明王朝的权威,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巩固了中华文化圈,也影响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从农耕文化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积极寻求海上贸易机会,从事航海贸易行业。但经济繁荣的滨海之地引来了倭寇的袭扰。这种情况在明初洪武年间的东南沿海就出现了。当时明朝强盛,海防巩固。尤其是方国珍次子方关降明后,敬献了战船,使明水军数量和战斗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政府在滨海地区都设置了卫所司,如有倭寇进犯,则以烽烟报警,相互支援。到了明嘉靖年间,日本国内连年征战,倭寇数量急剧增多,大肆骚扰我国沿海各地。此时明朝国力衰弱,国库空虚,海防疲软。明政府因此决定改变从唐宋元延续下来的宽松的海洋政策,实行海禁。明代的海禁政策时松时紧,时断时续。明面上的海外贸易停止,但民间走私行为并没有停止,向日本及南洋走私棉纺织品及丝织品的事情在不少文献中都可以寻找到。^③ 明代海禁政策,阻碍了航海贸易的发展,影响了海洋文化和海洋事业。

① [明] 费信,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4: 1.

②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团结出版社,2007: 147.

③ 参见《东西洋考》《见只编》《云间杂识》等。

到了清代,尤其是清初,海禁依然存在,主要是为了防范郑成功及明朝残存势力在沿海一带的抗清活动。顺治十八年,清政府甚至下迁海令,“尽徙沿海居民,严海禁”,在江南滨海之地“片板不容入海洋”(《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七〇)。清代限制出海船舶重量和规模,禁止海外贸易发展,只余广州一口通商,海外交流也多是政治朝见。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因此受到重重束缚,缓步不前。同时,国内的农耕经济也出现了土地兼并、人口膨胀等问题。这是中国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发展共同受到阻碍的时期。

从上述对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历史的梳理中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海洋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并在唐代发展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至明代前期,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保持了齐头并进的趋势。明中后期以后,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又共同进入了衰退期。

二、海洋文化及其危机本质

海洋文化,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与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① 海洋文化包罗万象,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所有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都属于这个范围。

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农耕文化(土地文化、内陆文化)而言的,前者具有开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开拓性等特点,后者具有稳定性、内向性、传承性和温性等特点。海洋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基本与农耕文化所具有的特点相反,这其实与两种文化内在的本质有关。简单来说,海洋文化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危机文化,而内陆文化

^① 曲金良. 海洋文化概论.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9: 3.

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安稳文化。

海洋文化的内在危机本质是由多变易逝的自然环境、充满危险的生产劳作环境、不稳定的家庭结构决定的。第一,滨海自然地理环境极易变迁。《神仙传》里,麻姑自谓:曾三见大海变为陆地,如今蓬莱山那里海水又清浅了,难道大海又要变为桑田了吗?沧海桑田的海陆变迁正是滨海先民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以上海为例。今上海市的南部位于杭州湾北岸,其东北部则是长江入海口。历史上的海陆变迁给上海的南部和东北部造成了不同的影响。总的来说,位于杭州湾北岸的上海南部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陆地沧海,而在东北部的长江口,短短几个世纪内,却生长出了几个岛屿,其中就包括我国第三大岛、上海第一大岛——崇明岛。大约在东晋时期(317—420年),杭州湾北岸遇到强海潮的冲击,其西南部大片陆地塌陷于海中。到了元代以后,这一带沧海的速度才减缓。

第二,无论是渔业生产还是航海贸易,涉海生产劳动都充满危险。以渔业劳动为例,渔民出海捕鱼往往是随着渔汛期的开始而去,随着渔汛期的结束而归,有时航行数月。如果遭遇到恶劣风暴天气以及触礁等意想不到的危险那就是有去无回。因此在沿海渔民中传唱着一种渔民妻子思念丈夫的“渔民五更调”,比如下面这首《盼郎五更》:

一更里来月儿弯,银钩走青山。奴奴把郎来思念,面对拉格明月独坐织衣衫。细把那多情丝理出我心怀,织件连心衫。

二更里来月上弦,寒风阵阵起。吹起花花布窗帘,那个寒风好似吹在我心间。我的郎,在洋地,冷热自留意,莫忘把衣添。

三更里来月中天,银霜洒地面。我把夫郎常挂牵,那个风啦霜啦与郎作伴侣。海潮涌,浪花飞,溅得轻一点,莫湿郎衣衫。

四更里来月偏西,雄鸡唱头遍。好像听到螺号起,我跨拉格海洋飞到郎身边。郎拉网,我掏鱼,笑脸对笑脸,恩爱称如意。

五更里来月落山,潮水退下滩。我盼夫郎早归来,那格绵绵情丝结成连心衫。送给郎,身上穿,暖呀暖胸怀,你我心相连!^①

五更调是一种汉族民间小调名,又称“五更曲”、“叹五更”、“五更鼓”。歌词共五叠,自一更至五更递转咏歌,所以又称为“五更转”。这首渔歌五更调流传于舟山群岛,抒发了对捕鱼郎的思念和关爱,体现了海洋渔业劳动的危险。

第三,滨海地区民众的家庭结构是不稳定的。家庭结构就是家庭成员的构成情况。常见的家庭结构有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是父母与一对已婚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模式,通常还包括(外)祖父母以及未婚子女;核心家庭是由父母和未成年(或未婚)子女构成的家庭。在这两种家庭中,最小一代子女或是未成年或是还未找到结婚对象。这些家庭结构在内陆地区常见。而在滨海地区,实际情况复杂得多。因为航海是男人的事,而航海又充满危险。所以常常出现家庭中只有母亲与其未成年子女的情况。有些家庭甚至几代人都是女性。福建惠安女及其特殊婚俗就是这样不稳定的家庭结构的产物。因为男子常年出海打渔,惠安女就成为家乡的主要劳动力,下海、耕田、开路、锯木、拉车等样样在行,惠安女因此成为吃苦耐劳的代名词。惠安女结婚时要穿一身黑,新婚第一夜要站在床边过夜,结婚三天以后要回娘家常住,除夕等重大节日才由丈夫接回婆家住一晚。直到生下孩子,惠安女才能正式居住在婆家与丈夫一起生活。这种婚俗与丈夫常年在外捕鱼,可能会遭受不幸有关。如果丈夫身亡而没有子女,惠安女还可以继续生活在娘家。

^① 方长生. 舟山市歌谣谚语卷.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9: 122 - 123.